

山西中文學術

明代
科
舉

明代科举与文学

郭万金 著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明代科举与文学

郭万金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科举与文学 / 郭万金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ISBN 978 - 7 - 100 - 11729 - 6

I. ①明… II. ①郭… III. ①科举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②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明代 IV. ①D691.3 ②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3074号

本书获得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明代科举与文学”支持(项目编号 09YJC751056)

“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支持

山西省青年拔尖人才项目支持

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中央财政专项支持计划: 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经费支持

山西省特色重点学科特色专业经费支持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明代科举与文学

郭万金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11729 - 6

2015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5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6

定价: 66.00 元

目 录

序说：问题、视野与材料.....	1
第一章 知识的储备：前科举的启蒙教育	6
第一节 前代的启蒙延续：《小学》、《孝经》.....	6
第二节 文学的启蒙与训练：从《千字文》到《千家诗》.....	24
第二章 科举时代的思想范式：四书与朱熹.....	41
第一节 朱子理路：为己与立本.....	41
第二节 四书规模：以天下为己任.....	51
第三章 科举范式的形成：从民间到官方	73
第一节 元代境遇：冷落中的升格.....	75
第二节 明代范式：无可撼动的传统.....	95
第四章 八股冲击与诗的位移.....	122
第一节 八股之重.....	126
第二节 八股之难.....	136
第三节 八股之余.....	146

第五章 科举格局与士人出处	158
第一节 学优则仕：科举取士的制度保证	159
第二节 人情之内：利诱之下的营私舞弊	170
第三节 名利之外：举业之外的别样情怀	182
第六章 科第心态与文学程式	193
第一节 八股套路的模式禁锢	193
第二节 制义技法的心理渗透	206
第三节 科名失落的情意排遣	218
余论	233
参考文献	238

序说：问题、视野与材料

君子立学，贵有根柢。所谓“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信而有征，根柢所在。“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②。弥纶群言，涵盖一代，贯通百家之言，寻迹千载之上，非史料不得。史料者何？言之“物”，言之“故”也。梁任公视之为“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喻以“史之组织细胞”，其“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③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基本逻辑下，史料自然有着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蔡元培云：“史学本是史科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④傅斯年更称：“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科学”^⑤。“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弥漫一时的史料尊崇体现着旧学传统与时代风潮的特殊交织，略显极端的言论中显然蕴藏着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价值取向。

论史必自材料发端。唐刘知几称：“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⑥无论是当时草创者的博闻实录，还是后来经始者的俊识通才，均是围绕史料的搜采辨析、取舍运用，区别处则在记录者的“在场”与否。意大利史学家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称：“历史研究的整套近代方法，奠基于原始史料与转手史料的划分此疆彼界。所谓原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页。

② [梁]刘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④ 蔡元培：《〈明清史料档案甲集〉序》，《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0页。

⑤ 傅斯年：《历史语言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⑥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1。

始史料，为目击者的陈述、文献以及事实自身的遗存，数者皆与事件同时。所谓转手史料，为史学家或编年家论述彼等所未及亲见的事件，仅凭传闻或直接或间接的参稽原始史料而来。称颂原始史料，为其真实可靠。称颂非当代的史学家——或转手史料——，为其对资料的解释与评价公正。”^①相距千年的中西会通无疑有着“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的学理意义。大略而言，史料之时代与史实发生时间越为接近其价值愈高，史料之地点与史实发生地点越为接近其价值愈高，时间（when）、空间（where）的客观要求之外，更涉及撰述传播者（who）的主观因素，可信程度与辨别能力。“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②。即便亲历、亲睹、亲闻，也未必能准确表明事实之真相。“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③。有意或无意的个人意识参入都可能产生偏颇，曲解真相。细节处固可以考信真伪，却也可能蔓为枝节，汨没本真。撰述传播者的主观介入使得史料价值的评估标准变得有些模糊，却也使得我们不得不认真面对所有的史料——原始的和转手的。

素有西方史学方法论鼻祖之称的伯恩海姆（1854—1937）曾将史料分为传说与遗迹两类。所谓传说包括“图画的传说，在用图画以表述历史上之人物、处所或事故；口头的传说中，包含有掌故、谚语以及历史性质之歌谣等；文字的传说，则有历史内容之铭志、日记、谱系、年志、回忆录、人物志等种种”。所谓遗迹则包括“遗物、文件书契、纪念物品等等”。西方史家之分类史料大抵沿此发挥，而余波复及于中国。^④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则以文字记录之内外为界，在文字记录以外者略分为现存之实迹、传述之口碑、遗下之古物，文字记录之史料则有旧史、关系史迹之文件、史部以外之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再现、金石及其他镂文、外国人著述。^⑤文字著述之外的有形实物、无形传说，于视野拓展之外，更有旁证之力。所谓“资之深，则取

① A. D. Momigliano, *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1966, p.2. 转引自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页。

② [清]方苞：《万季野墓表》，《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③ 同上。

④ 参见杜维运：《史学方法论》，第103—104页。

⑤ 参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0—60页。

之左右逢其原”^①。史料浩瀚如海，浸润其间，仰取俯拾，撷萃英华，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勉之以成一得之言。

有明三百年间，官修史籍，私人著述，诸体兼备，闻见杂博，取材赡宏，层累渐积，其数甚夥。《明史·艺文志》“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数莫考、疑信未定者，宁阙而不详”^②，收书数千部，然较之明代全部文献，不过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明代笔记野史当在两千种以上，至于明人别集的数量，就更为庞大了。据崔建英先生辑订，贾卫民、李晓亚先生参订的《明别集版本志》称：“当时全国近八百个藏书单位报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总编的，约十五万四千种，其中属于‘明别集’的一万一千种。审校中我们删除丛书和总集零种，合并复本（含批校题跋本），约得三千五百余种。此后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图书馆发现一些就当时所知中国大陆尚未见著录的‘明别集’复制品，亦予审录，并入此志，遂增至三千六百余种。”^③即便如此，亦未足为明代别集全貌，善本之外的民间留存，新近的文献发现，再及明代之后所刊刻的明人别集等，诸般种种，其数亦众。明代史料的留存丰富非仅文献一端，明时建筑、碑刻、故物存于今世者，比比皆是。以山西为例，在星罗棋布的大小寺庙中，大多可以毫不费力地觅到明代的石碑。

明代史料如此丰富浩瀚，分类甄别自然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行为。中西史学家关于史料的诸种区划，多就宏观立论，自有其可取之处。然而，当宏观的分类视角进入具体的专门研究时，不免有着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的种种影响，自然也便需要更加微观的分类观照。萧一山先生在论及近代史料时，曾言：“近人述史料者，每以西洋原料（primary sources of material 原直接史料）分等而言，如档案、实物、日记、手札，原料也；官书、传记、私人述作、口碑、报章，则次料也。原料之价值，恒过于次料，固不待论，但其间亦非有绝对的界线，治史者尤不可不知。如档案公文虽属原料，而所载对方之事，则为次料。咸同谕旨折奏之纪洪杨，即其类也。官书传记虽属次料，而所载本身之事，则仍系原料，蓝皮书之报告，曾、左、李之全集即其类也。私人笔记，述其见闻，半

①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27页。

② [清]张廷玉等：《明史》卷96。

③ 崔建英辑订：《明别集版本志》前言，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多道听之言，世固以次料目之矣，但有时所记事变之内幕，名人之轶事，以及制度兴革，社会情况，迥非官牍所能详，则仍属原料。如彭孙贻《客舍偶闻》，记康熙初年满人互相挤轧之状，历历如绘，岂官牍中所能见乎？礼亲王《啸亭杂录》所记清初轶事，每足匡补正史，又岂官牍中所能见乎？故原料与次料也者，乃就关系之直接与间接而言，非其本身即具此特质也。”^①斯言诚是！史料之直接与间接并无绝对的明确界线，关键在于论析史料时的切入角度，而切入角度则大抵关系于所研究之问题。

谢国桢先生在其《史料学概论》中曾将明清史料分作四项，计有：官修的实录和邸钞；明清时代存留下来的档案文件；明清时代的野史稗乘；明清时代的文集和地方志的资料。不难看出，谢国桢先生的分类隐含着直接、间接，官修、私撰的综合思考。但这一思路如果完全套用于“明代科举与文学”这一专题之上，则不免有些粗疏。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则是以“科举与文学”为名的导先之作，开篇第一章便是“材料叙说：唐登科记考索”。首论清徐松所撰《登科记考》，以之为最为重要的关于唐代科举的专门史料，次及唐宋人所作的登科记，再及“唐代科举与文学”这一专题材料学，计有：正式的史书如《通典》、《文献通考》、《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料笔记如《唐摭言》、《唐语林》、《封氏闻见记》、《隋唐嘉话》、《朝野僉载》、《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因话录》、《剧谈录》等；另有一部分是唐代新兴的传奇小说，单本如《玄怪录》、《续玄怪录》、《独异志》、《博异志》等，总集如《太平广记》；此外则有唐人的诗文，《全唐诗》、《全唐文》等。^②研究对象的类同使得傅璇琮先生的分类思路有着更为贴近的可借鉴性。然而，前贤的经验并不可以照搬，关于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史料视野亦不能以“明代史料”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简单拼接而成立。

问题决定视野，史料的甄别、选择、分类大抵皆因问题生发。科举是明代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几乎明代社会的所有角落，都弥漫着浓厚的科举气息。有明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学术、文学乃至与当时世界的各种联系都存留着科举制度的影响。即此而论，整个明代的各种史料无不可以视为科举

① 萧一山：《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志林》第3期，1942年1月。

② 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之史料——直接的与间接的。明代文学在这样的科举氛围中形成、发展，当然与科举制度不断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科举或者直接影响文学过程，或者通过对社会政治、经济学术、人文心态的有力渗透而间接作用。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使得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间的界线更为模糊，进而要求我们的史料视野更为宽广，更为审慎，以点带线，以线带面，以问题意识关联全篇，从问题入手，因问题生发，不去做那些看似面面俱到而了无轻重差别、分析判断的程式叙述。“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槧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①“科举与文学”的命题横跨文史，牢笼一代，“征求异说，采摭群言”自是最为基本的应对策略，然而入山求珍，还必须有一条贯穿始终、可资进退的自家路径，否则，或陷于材料之堆积，烂然满目而无法取材，或累于新旧之层叠，横竖错乱而无序可寻。所谓的“自家门径”其实便是“科举与文学”这一命题中的核心关注。科举所以成为重中之重，乃在“人才”之维系，其核心凝聚力便是于中国传统影响至深至广的“士”阶层，关于明代科举与文学的讨论自然要落足于一代兴衰所系的士人身上，而三百年间，明代士子们的思想渊薮、知识谱系、政治诉求、社会定位、人文情绪等自然也便成为我们入山觅宝的“自家路径”。

梁启超曾言：“资料少既苦其枯竭，苦其挂漏，资料多又苦其漫漶，苦其抵牾。加以知人论世，非灼有见其时代背景，则不能察其人在历史上所占地位为何等，然由今视昔，影像本已朦胧不真，据今日之环境及思想以推论昔人，尤最易陷于时代错误。”^②科举系明人生活第一要义，更是明代士人的第二生命。从某种程度而言，明代社会或可称之为“科举社会”。在并不均衡的史料格局中所以特别拈出的“自家路径”正是梳理、阐释的基本思路，明代士人在科举社会中所学所思，所作所为，所感所悟，又及政令制度的硬性规定，并有及第下榜间的人情冷暖，乃至读书备考的经济基础，诸般种种，皆是关注所在，循此路径，一一探寻，辨析取舍，力求少犯些“时代错误”，更为逼真的呈现明代科举与文学的历史原貌。

① [唐]刘知几撰，[清]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5。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59页。

第一章 知识的储备：前科举的启蒙教育

在明代，“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①是最为寻常的读书态度。明初的许存仁“恪守家教，一宗紫阳，非五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②。成化年间的罗伦“自少力学，非五经四书、濂洛关闽之说不讲，而非圣人之书未尝一接其目”^③。许存仁是被朱元璋擢升的国子监祭酒，罗伦则是大魁天下的一朝状元，颇具成功典范的样板意义。然而，借读书而成就的人生规范却远远不能涵盖全部读书人的知识世界。四书五经的特殊影响因科举而凸显，整个明代社会的知识格局以四书五经为核心而辐射，作为核心的圣人经典却不适合成为知识的起点。举业之前的知识储备自然以科举为鹄的，但是实际的启蒙路径自然有着由浅入深的教化选择。至于历代教学经验的延续与继承，不仅是一种启蒙教育的现实策略，更是一种深入人心的教化传统。

第一节 前代的启蒙延续：《小学》、《孝经》

社学在明代系官立小学。“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尽得预焉。又谓之社学，盖即党庠序之遗也。”^④没有太多资格限制，凡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可送入读书，所学习的内容大抵不出四书五经之规限，尤以四书为重。作为

① [清]陈鼎：《东林列传》卷2。

② [清]沈佳：《明儒言行录》卷1。

③ [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卷9。

④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2。

启蒙的则是朱熹的《小学》，明人陈儒称：

凡士庶子弟入学者，先之以文公《小学》，使之爱亲敬长隆师亲友大意。然后进之以《大学》、《中庸》、《语》、《孟》，并各经听其习读，以广其闻见，示之圣功。提调官岁终将教读并子弟考校，随其高下，量行赏罚，听候本道按临考选，用广人文。^①

传统教育历来注重循序渐进，如此的教学次第，显然是朱熹思路的一脉相沿。《小学》之作，据朱子书信所载，由朱熹主持，主要参与者为弟子刘清之，字子澄，世称静春先生。全书六卷，分内外两篇。内篇分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四部，外篇分嘉言、善行两部。每部之下，各有细目，多寡不同。“立教”篇下无目，“明伦”篇则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交”、“通论”六目。至于《小学》的立意指向，朱熹在自序中有着这样的表述：

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扞格不胜之患也。今其全书虽不可见，而杂出于传记者亦多。读者往往直以古今异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无古今之异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颇搜辑以为此书，授之童蒙，资其讲习，庶几有补于风化之万一云尔。^②

在“修齐治平”的养成路径中，“幼稚之时”成为不容回避的讲习原点，而“补于风化”则是毫不迟疑的基本关注。最好的注脚则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所阐明的“为学立场”：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

① [明]陈儒：《芹山集》卷24。

② [宋]朱熹：《小学原序》，《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93页。

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己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①

作为读经之前的铺垫，《小学》显然有着特殊的道德指向，着力将经学的路向由“辞章利禄”引向“修己明理”，而此正是《小学》之作标举“明伦”的用心所在。明儒刘宗周云：“古之人由小学而入大学，故学以明伦，必自庠序始。”^②更将“明伦”视作贯穿“小学”、“大学”的基本理念。古已有之的传统可以溯源至人文之始，亦成为明代士人的普遍认同。如余继登《汾阳县儒学记》曰：“学以明伦，自三代至今未之有易，非不欲易，以穷理尽性此其本原，化民成俗此其要务，不可易也。”^③曹于汴《荐举策》亦言：“三代之学以明伦也，君子之学以致道也。”^④“学以明伦”的道德关注使得《小学》以一种规范姿态成为明代社会的启蒙教材。如万历年间的《于氏家训》中有着这样的规定：“大凡男女五六岁时，知觉渐开，聪明日启，便当养育良知良能。男则令其就塾，教以《小学》、《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古人孝亲、悌长、敬身、明伦等行；女则令其不出闺门，亦教以《小学》、《列女传》、《内则》诸篇古人孝姑、敬夫、教子、贞烈、纺绩等事。务要使其朝夕讲诵，熏陶渐染，以成其德性，敦复古道，感动奋发，而见义勇为。”^⑤而何塘《家训序》也强调：“子孙有聪明者，则渐教以《小学》、四书、五经、诸史可也。”^⑥家训序列中的规定书目当然有着不容置疑的“必读”要求，藏于其后的正是传统中国的“立德”关注。明初，“后令诵《小学》书，注意听之。既而奏曰：‘《小学》书言易晓，事易行，于人道无所不备，真圣人之教法，盍表章之。’帝曰：‘然。吾已令亲王驸马太学生咸

① [宋]朱熹：《晦庵集》卷74。

② [明]刘宗周：《古小学记小序》，《刘宗周全集》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30页。

③ [明]余继登：《淡然轩集》卷5。

④ [明]曹于汴：《仰节堂集》卷10。

⑤ [清]于树滋纂修：《于氏十修家谱》卷2。

⑥ [明]何塘：《柏斋集》卷6。

讲读之矣。’”^①开国君、后的着力表章自然有着格外的影响力，诏令之下，四海之内，莫不家藏人诵。

有明一代，《小学》的普及、影响自非寻常之作可以比拟。从内容讲，《小学》关涉经、子、史三部；以理念论，正与《大学》一脉相沿。按照传统的书目分类，刘歆《七略》中“六艺略”已有“小学”之目，南朝阮孝绪《七录》之“经典录”亦存“小学”，《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立，“经部”列“小学”。明末黄虞稷所撰《千顷堂书目》，“所录皆明一代之书”，其中经部分十一门，“小学”与列，关于“小学”的著述达二十余种，撰者之中不乏名儒贤达。前代存目的丰富，均说明了《小学》在明代的普及以及受到的重视。对于明代社会而言，作为启蒙之基础的《小学》，于潜移默化的熏染之中所表现出的规范张力，自是不言而喻。朱子所倡导的道德养成路径以一种圣贤姿态进入明代的读书世界，指向明确，立场分明，希望以童蒙时的德行塑造对抗不可回避的“干禄”之学。有明一代，自然保持着传统的道德惯性，儒家的理念凝结、朱子的苦心设计，明代士人的努力，《小学》于一般德性的幼年塑造中，呈现出了不容忽视的张力。

必须指出的是，《小学》的道德熏染并不能完全扭转科第功名的直接影响，因急功近利而偏离《小学》之志者，并非少数。明儒周琦称：“朱子摭拾前言往行可为《小学》、《中庸》者，编辑成书，立为小学之教，是为大学以立其本，如今人见小儿颇可教者，不先教以小学洒扫与通经史以立大学根本，便教拈弄文词，以图侥幸科目，世安得有全才哉。”^②所言不谬。隆庆进士李乐自言：“予为童子入乡塾，蒙师训其子弟，往往多读《小学》、《孝经》。迨予四十以后，读者鲜矣。”^③科第入学渐深，风气转移，《小学》不免冷落。万历年间，以吏为官的葛昕称：“余为诸生时，犹及见蒙少必读《小学》，而《孝经》一书，即穷乡塾师亦知令其徒童而习之，今《小学》在里师处不多见，而《孝经》至市坊无售。本如之何，望民兴行以成善俗，宜乎悖德忘本者接踵也。”^④一时风气，于

① [明]解缙：《古今列女传》卷1。

② [明]周琦：《东溪日谈录》卷12。

③ [明]李乐：《见闻杂记》卷8。

④ [明]葛昕：《集玉山房稿》卷6。

中略见。又如叶春及的《颁小学书》也极力辨析“富贵”与“善圣”间的差异，其称：

富贵，人之所欲也，所欲有甚于富贵者，善人圣人是也。何以明之？称富人贵人善圣，拱手曰不敢，以是知富贵之不如圣善也。贫贱，人之所恶也，所恶有甚于贫贱者，恶人愚人是也。何以明之？以恶人愚人目贫贱人，则攘臂而争之，以是知愚恶之不如贫贱也。今有子，财免襁褓，则授之句读，择其合时好者熟复焉，不过望为富贵人耳，而岂有意于善人以至圣人者哉。《小学》书者，涂人可以为圣人者也。忝为父母，所以望子者厚，颁而肄之，选学官弟子，则以是课之矣。^①

反复叮咛之中，正折射出科第功名影响下的富贵逼人。对于《小学》之学圣途径的一再强调，正是晚明有识之士的基本判断与一致努力。对于德性培养的本源回归正是《小学》原初的编纂理念，在数百年的科第历程中，不幸在功名富贵的挤压下变形扭曲，如想矫正，必须有正本清源的努力，然而这样的努力十分不易，想同科第心态的巨大惯性对抗，其收效大约是不容易看到的。

《小学》的冷遇，科第的功名导引自然是最为主要的外因，就其自身而论，《小学》以德行培养为鹄的，对于童蒙的知识水平、接受习惯未暇认真思考，以致有“难学不便”之议。陆世仪称：“小学之书，文公所集，备矣。然予以为古人之意，小学之设是教人由之，大学之教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则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废也。”^②陆世仪系明末清初江南大儒，宗程朱，重实用，特别的“便学切实”关注，有的而发，切中肯綮，不失为有识之论。

在明代的童蒙读物中，唯一可与《小学》可并驾齐驱者，便是《孝经》。“洪武中，每坊厢各建一区，以学行耆旧者为之师。其子弟悉令通《孝经》、《小学》

① [明]叶春及：《石洞集》卷9。

② [清]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1。

诸书。”^①各类社学条令、族规家训中，二者每每并行。关于《孝经》的作者与时代，最早的记录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参，南武城人，字子舆。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②历代句读训读不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成为了毋庸置疑的道德原则、传统社会的价值凝结，使得《孝经》的地位不断提升。郑玄称：“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③汉代以“孝治天下”，所谓“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的圣人准则流行天下，而《孝经》亦以经典的面目进入士人的世界。有唐一代，唐玄宗“于先儒注中，采摭菁英，芟去烦乱，撮其义理允当者，用为注解。至天宝二年注成，颁行天下”^④。天宝三年，又诏令：“自今已后，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⑤唐文宗开成二年，刊刻石经，孝经与列。从作为官方象征的博士设置到君王至尊的亲自疏解，从一般意义的必读书目到科举考试的规定科目^⑥，《孝经》在历代帝王的特别关注与不断升温的政令要求中，广受尊崇，风行天下。赵宋右文，孝道之隆盛，不逊前代。君王诏令，朝廷褒奖，“劝孝勉悌”，史不绝书，《孝经》之普及民众、深入人心自非寻常典籍可以企及。在宋代士人的家训中，《孝经》多半是学童启蒙的首选经典，如司马光《书仪》称：“七岁，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诵《孝经》”。有宋一代，关于《孝经》的大事，便是从科举考试中退出。《宋史·选举志》载：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其后遵行，未之有改。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今以科目、学校之制，各著于篇。

① 乾隆《江宁新志》卷9。

② [汉]司马迁：《史记》卷67。

③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④ 同上书，第4页。

⑤ [宋]王溥：《唐会要》卷35。

⑥ 《通典》卷15载唐代“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发榜于尚书省。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①

在诸多的科目中，《孝经》仍是“学究”科目的考试内容之一，但所占比例并不算高。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下诏：

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②

在因减少名额而增设的“明经”科中，《孝经》虽有一席之地，但所占份额亦不算大。宋神宗熙宁四年（1072），王安石变法，科举考试内容变化如下：

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③

至此，《孝经》完全退出科举考试之规定目录，此后历朝科第相沿，试法虽有变化，但《孝经》则始终没有再成为科考之必考书目。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孝经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155。

② 同上。

③ 同上。